

中国通史故事全编

强国保种的抗争：
中国近代历史故事
(之七)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故事/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

ISBN 7 - 225 - 02048 - X

I . 中... II . 北... III . 历史故事—中国—先秦—近代
IV .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3153 号

中国通史故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 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40

字 数 60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 - 225 - 02048 - X/K · 148

定 价 600.00 元(全 6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 目 录 ☆

同盟会的成立和革命的高涨	(1)
《民报》出版	(3)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争	(6)
《革命军》	(12)
起义与暗杀	(14)
“炸弹大王”喻培伦	(17)
萍浏醴起义	(20)
黄花岗	(23)
清末预备立宪	(26)
立宪始末	(29)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32)
一手捞十六颗夜明珠	(35)
南社成立	(39)
收回利权运动	(42)
保路运动	(45)
清末皇族内阁	(47)
武昌首义	(50)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55)
宣统退位	(57)
遣散太监	(58)

辛亥南北议和	(60)
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	(64)
袁世凯的窃国复辟	(67)
袁世凯与逊清皇室	(70)
共和军与定武军交战	(71)
庆亲王奕劻之死	(72)
陈宝琛	(74)
梁启超与杨度	(76)
联讽袁皇帝	(79)
武昌首义佳人李淑卿	(80)
讨袁战争	(83)
护国战争	(90)
宋教仁一死所关	(96)
严复盛名累身	(96)
黄侃轶闻	(99)
王湘绮门下三匠	(100)
程璧光护法前后	(101)
“诗僧”苏曼殊	(108)
虚谷	(110)

◇ 同盟会的成立和革命的高涨 ◇

随着革命小团体的络绎出现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拥戴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孙中山看到爱国民主运动的频繁兴起，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经常出现，因而信心更足。1904年，他在一篇题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文章里指出：“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为此，他认为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1905年7月，孙中山到达日本。他的倡议得到黄兴、陈天华等人的赞同。7月30日，在东京召开筹备会，到会的主要是兴中会、华兴会的负责人和部分成员，还有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的几个成员和各省的留学生。会上通过新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

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百余人。大会通过《中国同盟会章程》；举孙中山为总理，成立本部，推选黄兴等分别负责各项工作；确定各省主盟人，主持各该省发展组织等有关事项。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

同盟会的纲领，以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实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他在解释这一主张时说，以为“驱除鞑虏”是要灭尽满族，

那是大错特错的。民族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清朝政府，解除满族皇帝贵族对人民的压迫，不是对一切满人寻仇报复。这种解释，是符合广大人民意愿的。但是，它只限于反对满族贵族政权，而忽略了更主要的方面，即如何使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获得民族解放。所以，同盟会的纲领中缺乏明确的反帝的主张。

“创立民国”，是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旨在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严正指出，只靠民族革命，还不能解决几千年来君主专制问题，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封建王朝，在当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平均地权”，孙中山称作民生主义。这表明一部分激进的革命者具有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争取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愿望。他们主张采用核定地价，把革命后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增涨的地价收归国有的社会改良办法，去杜绝“少数富人把恃垄断的弊窦〔dòu 豆〕”。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地主阶级对土地的集中和兼并，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但他们并不赞成穷人起来“夺富人之田为己有”，用革命手段彻底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真正领导农民完成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同盟会联合了分散的革命组织，建立统一的机构，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说明它已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和职能，从而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较快的步伐，在较大的规模上向前发展。孙中山后来回顾说：同盟会成立“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

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但是，由于参加同盟会的人存在着民主主义程度上的差别，同时还或多或少保留了封建性的大汉族主义、地域观念等旧的意识，因而在政治上，成员间的见解并不一致，完全服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是少数。而且，组织机构不健全，本部远在日本，对国内活动的指导，不免有鞭长莫及的局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同盟会还不是组织严密、政见划一的政党，而是一个松懈的、在共同反对清朝统治的基础上结成的联盟，以致它不能对全国的革命运动进行得力的、真正有效的领导。

◇ 《民报》出版 ◇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居留日本，奔走檀香山、南洋、澳洲、美洲各地，建立保皇会，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诋毁革命。梁启超还曾佯称愿与孙中山合作，诱骗许多兴中会员（包括孙眉）转入保皇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启超从美国回日本后，宣布“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

孙中山曾为梁启超的“合作到底，至死不渝”的发誓所欺骗，想同康梁派合作。但是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孙中山到檀香山看到保皇会的严重危害，痛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于是相继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两文，揭破保皇派的“爱国”是爱虐

民媚外的“大清国”，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第二年夏，孙中山到美国几十个城市访问，在华侨中广泛宣传革命，驳斥保皇派谬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6月，宋教仁、程家桢等在东京创办《二六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反清革命。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时，由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社员有半数加入同盟会，大会根据黄兴提议通过以这个杂志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九月三日，在孙中山监收下，宋教仁、黄兴办完《二十世纪之支那》移交手续，因其第二期载有揭露日本侵华的文章而被全部没收停刊，遂易名为《民报》，另行出版。

是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初定月刊，后为不定期，每期六至八万字。编辑部设在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发行所设在东京半多摩郡内藤新宿宇番集町三十四番地宫崎寅藏家中。《民报》共出版二十六期，附另外一张、《天讨》增刊一册。先后署名为编辑兼发行人的有张继、章炳麟（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实际主编人，前五期是胡汉民；第六至二十四期，主要是章太炎（其中几期由汪东、刘师培代编）；最后两期是汪精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出至第二十四期，日本政府受清朝政府请求，下令查禁。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一日，汪精卫任主编复刊，秘密刊行第二十五期，标称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出版，实则仍在日本印刷，出至第二十六期即停刊。《民报》以刊载政论文章为主，分论说、时评、译丛、纪事、撰录、图画等栏，多数稿件由本

社成员撰写或编译。主要撰稿人有章太炎、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汪东、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刘师培、黄侃、汤增璧等。

《民报》“以振扬革命理论，阐明三民主义为宗旨。”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鲜明地揭示出了三民主义的旗帜。当时，保皇派的《新民丛报》等刊物正在风行，对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影响。《民报》的出版，就使得革命派同保皇派的大论战全面展开，推向高潮。《民报》创刊号发表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族的国民》，点名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的惑众“妖言”和“盛涌夫君主立宪之美”诸种谬说。康、梁立即在《新民丛报》上作出回答，并把他们文章辑成《中国存亡一大问题》小册子，加印万份，散发到社会。两报的大规模论战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开始，在《民报》第三期上刊载的《民报之六大主义》，“足为是报详确之宣言”，公开了其基本政治主张；并在长篇政论《希望满洲立宪者曷听诸》中，对《新民丛报》诸论点以逐一批驳。随后又发行号外，列举《民报》和《新民丛报》根本分歧的十二个问题，表示“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辨驳，期与我国民族决此大问题”，论战剧烈展开。《民报》所载的和《新民丛报》论战的文章，集中在第三期到第十七期这十几期上。以革命派的《民报》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同时有广州、上海、天津、香港以及新加坡、曼谷、仰光、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国外各地，双方的二十多种报刊参加论战，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保皇派“气为所摄”、“口为

所钳”。这场大论战实际内容主要是三个问题：一、要不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洋奴”清朝政府；二、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共和政权；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解决土地问题。《民报》驳斥了保皇、“开明专制”、反对平均地权、向清政府请愿等主张；传播了反对清朝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平均地权，武装起义等革命主张。但在论战中，把革命限于“排满”，害怕“自发暴动”会招致“内乱”、“瓜分”，不去触动西方列强在华特权。《民报》还积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俄国革命等。《民报》出版后，风行国内外。创刊号重印七版，发刊达六千册；其余各期也多次重版，销数达四五万册以上。《民报》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做了进一步的舆论准备。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争◇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关于民主革命的辩论，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前后已初露端倪。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1月《民报》创刊而全面展开了。

《民报》从创刊起，革命派就主动向改良派发起进攻。创刊号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从正面阐发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其余的大部分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改良派的“保皇”论调进行了批判。汪精卫著《民族的国民》，从“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方面，驳斥改良派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的主张。朱执信著《论满洲政府虽欲立宪而不

能》，则从历史经验的角度，驳斥了改良派的“立宪易，革命难”的谬论。陈天华用思黄笔名撰写《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批判改良派的“欧美可以行民主，中国不可以行民主”的谬论。陈天华的另一篇文章《中国革命史论》，则系统地论证了秦末以来革命斗争的历史，批判了改良派的“中国不如泰西，泰西可革命，中国不可革命”的谬论。从此革命派旗帜鲜明地向改良派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论战之初，改良派在舆论界的活动能量仍然是很大的，他们对革命派的挑战并不示弱。康有为、梁启超立即在《新民丛报》上作出了回答。并把在该报上发表过的阐明他们观点的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章，辑成一本题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小册子，加印一万多份，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对《民报》进行了较为强硬的应战。此时为了与改良派“划清界限，不使混淆”，以便更有力地给改良派论调以迎头痛击。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28日出版的《民报》第三期上，首先发表了汪精卫写的长篇政论《希望满洲立宪者曷听诸》，列举《新民丛报》文章中的一些论点，逐条地进行批驳。这篇文章洋洋数万言，分载《民报》第三、第五两期，发表的时候，还在正题下面增添了一个副题，“附驳《新民丛报》”，是《民报》所刊系统批判《新民丛报》各种观点的第一篇文章。同时，这一期还以号外的形式，单独印行《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了双方在十二个问题的根本分歧：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

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

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

十一、《民报》以为革命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仅以得专制。

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革命派宣告“本报以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然使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故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辩驳，欺与我国民解决此大问题。”这样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主要喉舌在中

国近代史上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论战。

在这期间《民报》发表的指名和《新民丛报》辩论的主要文章有《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斥新民丛报之谬妄》、《就伦理学驳新民丛报之论革命》、《驳革命可以召爪分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新民丛报之怪状》、《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答新民难》、《杂驳新民丛报第十二号》、《新民丛报杂说辨》、《杂驳新民丛报》、《斥新民丛报土地国有之谬》等数十篇。而《新民丛报》也先后发表了《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暴动与外国干涉》、《杂答某报》、《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等二十多篇。

双方论战主要问题有三：一是革命，还是“保皇”？也就是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即关于所谓“种族革命”的论战。二，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即关于所谓“政治革命”的论战。三是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平均地权？即所谓关于“社会革命”的论战。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规模较大，时间较长，两军对垒、阵线分明。论战不仅全面展开，而且向纵深发展，除《民报》和《新民丛报》在东京的对垒外，在南洋有革命派的《中兴日报》与改良派的《商报》论战；在香港有革命派的《中国日报》与改良派的《香港商报》论战；在旧金山有革命派的《大同日报》与改良派的《文兴报》论战；在温哥华有革命派的《华兴日报》与改良派的《日新报》论战；在檀香山有革命派的《檀香新报》与改良派的《新中国报》论战；在新加坡有革命派的《中兴日报》与改良派的《南洋总汇报》论战；在泰国有革命派的《华暹日报》

与改良派的《启南日报》论战；在印尼有革命派的《泗滨日报》与改良派的《鸟岛日报》论战等等。它们各自和《民报》及《新民丛报》保持密切联系，就大体和两报辩驳纲领相同的一些题目，在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孙中山除一度去南洋一带筹款和进行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外，始终坐镇东京，指挥战斗。他除了出题目组织专人写作批判文章外，还经常用口授大意，提供论点论据的办法，让别人执笔，写成专文，参加论战。《民报》第十二期署名民意的《告非艰民生主义者》，第十五、十六期署名县解的《土地国有与财政》等等，都是用这种方方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写作出来的。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民报》方面参加论战的有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汪东、廖仲恺、章太炎等，都是同盟会宣传战线上的一时之选。相形之下，《新民丛报》方面力量就显得单薄得多了。编辑部里能够披坚执锐和《民报》诸人周旋一番的只有梁启超一人了。

对革命党人的“其势益张”和革命报刊宣传日益“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梁启超自然是不甘心的。他曾经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表示了：“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大有和革命派及其报刊周旋到底的意思。但是，由于人心的背向，论战的形势越来越不利，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不得不改变计划，实行退却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7月，《新民丛报》上首先刊出了徐佛苏以佛公笔名写的“来函”《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以第三者的身份出来调停，希望论战双方“逐渐恢复秩序”。这封名为来函的稿件完全是在梁启超的示意下炮制

出来的。

次年一月，梁启超又找出徐应奎，通过宋教仁向《民报》要求“调和”。解释说：以前和《民报》论战是出于“不得已”，希望双方“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

在此前后，梁启超还亲自出马，“私见汪精卫，欲以乡谊动之”，希望《民报》方面降低温度，停止辩论。

但是《民报》方面却不肯就此善罢甘休。针对《新民丛报》的《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光绪三十二（1906年）12月出版的第十期《民报》上刊出了汪东化名“弹佛”写的《驳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揭发号称第三者的“佛公”并不是什么“局外之人”，而是“党於新民者也”，表示论战既已开始，就不能“以一纸息其争”，要求《民报》“犁庭扫穴、不留余种”的干下去，不获全胜，厥战不止。对梁启超通过徐应奎进行的那次试探，孙中山的回答是明确的，他反对“可以许其调和”的主张，坚持把论战进行到底。汪精卫也以“仆等与《新民丛报》宗旨不同，感情何能相洽”为词，拒绝了停止驳论的建议。因此，在《民报》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论战继续了一个时期。

次年五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九十二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哀叹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政府为集权，置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钳。”实际上给论战做了一个小结。梁启超在“凄然”、“泪眼”下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 《革命军》 ◇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中国形成了一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组织进步团体，创办报纸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和国内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苏报》、《童子世界》等等报刊杂志，广泛地传播了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中，涌现出不少卓越的宣传家。其中陈天华、邹容、章炳麟影响最大。

陈天华写了两本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以通俗浅显的文字，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揭露了清政府的投降卖国，控诉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他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他极力号召：“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工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他痛斥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洋人的守土官长”，把中国“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他鼓动大家起来革命，“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这两个小册子，在当时“风行于世”，受到大家的欢迎，对鼓舞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起了积极作用。

青年革命家邹容，发表了《革命军》一书，无情地揭露了清政府的残酷压迫和黑暗统治，公开地指出满族贵族的腐朽卖国，是中华民族陷入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根源。他热情地颂扬了民主革命，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极力宣传欧美的政治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学说。他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他明确地提出革命建国的纲领，满怀信心地呼唤：“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革命军》像一颗巨型炸弹，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清政府逮捕了邹容和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查封了发表《革命军》的《苏报》，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邹容被判两年徒刑，不幸死于狱中，为革命献出青春。但《革命军》风行海内外，销售上百万册，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浪潮。

章太炎又叫章炳麟，是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他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有力地揭露了清朝反动政府的黑暗，严厉地斥责了康有为等保皇派对革命运动的诬蔑，公开痛斥光绪皇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着力宣扬革命不但可以作为“天雄大黄之猛剂”，还能成为“补泻兼备之良药”，指出了“合众共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明确地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

由于他在《苏报》上发表了这一战斗的文章，遭到了反动派的逮捕。章太炎毫无惧色，对巡捕和警探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认为“革命没有不流血